

国际关系理论是普世性的

阎学通

2005年11月,在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举办的北京国际关系研究生论坛上,有关建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问题再次成为热点。随着中国实力与地位的上升,学界和政界都在呼唤创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笔者以为,国际关系理论本身是没有国家性的,因此创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目标是无法实现的。

真正意义上的理论都是人类的公共物品,没有国籍的排他性。现代国际关系理论中最流行的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都没有国籍,所有国家都可以使用它们。虽然这三种理论的创建者都是美国的学者,但这些理论的创建者们并不认为他们的理论是美国理论。这如同孔子、管子、墨子和老子分别是儒家、法家、墨家、道家的创建者之一,他们虽是中国古代先贤,但他们的思想理论却是普世的,他们从未称自己的理论是中国理论。英国学者牛顿是古典物理学理论的创建者之一,他也不将自己的理论视为是英国的理论。国际关系理论中“英国学派”一词与“芝加哥学派”、“哥本哈根学派”、“佛罗里达学派”一样,是指那些系统性还不太完善的理论思想,并不意味着这些理论思想具有国家或民族性。

不仅理论创建者们没有把自己的理论归属于某国,而且事实上也不存在有国别的理论。理论是在百家争鸣的条件下创建的,因此在某些理论创建的过程中必然伴随着与其假定和结论相对立的其他理论。这些相互对立的理论同时存在,因此我们无法确定何种理论可以作为一个国家的理论代表。例如,自一战以来,由美国学者发明了很多国际关系理论,这些理论在很多方面都是相互对立的,美国政府在不同时期用过不同的理论解释对外政策,我们怎么判断哪些理论是美国的理论呢?

理论研究与政策研究的重要区别之一就是它们的研究目的不同。理论研究在于发现规律,而政策研究在于实现国家利益。目的上的这种区别决定了理论研究坚持普遍性原则,而政策研究则采取国家利益原则。国际关系理论的科研成果可以被对立的国家使用。例如,区域化理论的原理之一是区域化需要明确的地理界线,泛区域政策影响区域化的深入。根据同一原理,中国坚持东亚共同体以“10+3”为基础,限制区域外的国家参加,以便促进东亚区域合作;美日则采取开放性原则,让亚太国家都加入东亚共同体,从而使东亚共同市场建立不起来。

不同国际关系理论的创建会受到不同文化的影响,但这绝不意味着人们有能力创建有国别的国际关系理论。借助先秦政治思想创建新的国际关系理论是中国学者的优势,但这并不意味着创建成的理论是中国的理论。一是我们只能是在现代国际关系理论的基础上,吸收先秦文化精华创建新理论。也就是说,将来中国学者创建了有系统的国际关系理论,它也是一种普世性的理论,而不是国别性的理论。二是在创建过程中我们只有博采众长才能创造出有生命力的理论。这是说,将来中国学者在国际关系理论建设方面取得了系统性的成果,也含有多种理论的要素。

中国学界在国际关系理论创建中遇到的问题不是没能创建出有中国特色的理论,而是没能创建出系统性强的理论,理论研究长期停留在产生相互矛盾的思想火花的水平上。加强方法论、古代政治思想和现代国际关系理论体系三方面的学习,将有助于我们尽快创建系统性完整的理论。